

諸夷

考釋

「明」郭子章／著 杨曾辉 麻春霞／编著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諸夷考釋

[明] 郭子章 / 著 杨曾辉 麻春霞 /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记·诸夷》考释 / 杨曾辉、麻春霞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1 - 10291 - 1

I. ①黔… II. ①杨… III. ①贵州省 - 地方史 - 明代
IV. ①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898 号

《黔记·诸夷》考释

[明]郭子章著 杨曾辉 麻春霞编著 杨庭硕审订

责任编辑 / 沈晓枫 王 平 孔令敏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印 制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8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10291 - 1

定 价 / 32.00 元

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吉 首 大 学
贵 州 大 学
贵州师范大学
凯 里 学 院
贺 州 学 院
贵 阳 学 院

联合推出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杨庭硕 张新民

主 编 罗康隆

副 主 编 李汉林 吕幼樵 徐晓光 李晓明

编委成员 游 俊 龙先琼 暨爱民 瞿州莲

陶渝苏 李红毅 李景寿 石 锋

郑茂刚 李汉林 韦浩明 赵平略

总 序

罗康隆

《黔记》的原作者是明末知名学者郭子章,该书系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利用公务之余编就的一部贵州地方志。《黔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体例完备,是一部明代难得的私家著述,是了解明代贵州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史料总汇。因此,在明代所有私家著述中,其对明代贵州研究的价值极高。为了纪念贵州建省 600 周年,吉首大学联合了贵州、广西 6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位学人历时 10 年对该书展开了系统研究,汇编为本丛书,意在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唤起今人对贵州历史的关注,深化对明代贵州的认识。丛书分编为 26 部出版,预计在 2018 年出齐。

郭子章《黔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版本刊刻于明崇祯年间,目前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孤本。此外,贵州省图书馆在沈子英主持下,曾出版该书的油印本,但流传不广,讹误较多,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更鉴于《黔记》原作从出版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 400 年,贵州全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读者要直接利用《黔记》原作,必将会碰到诸多的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理解上的讹误。为此,对《黔记》原作展开系统研究刻不容缓。丛书课题组正是针对这一紧迫需要,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办法,对原作展开系统考释,希望在如下四个方面给今天的读者提供帮助与支持。

首先,作为一本私家著述,《黔记》作者必然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和对贵州的理解去编撰该书,对当时的读者而言,《黔记》出版的社会和自然背景,读者很容易做到全面系统的了解,直接阅读该书不会遇到太大的

困难;但今天的读者则不然,由于400年来整个贵州省乃至全国的社会和自然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握不住当时的背景就难免会对原作误读和曲解。此次开展的系统研究,使命之一就是要对原作记载的相关内容提供翔实可凭的社会及自然背景,使今天读者能够立足贵州社会和自然背景去阅读和征引《黔记》原作所提供的史料。

其次,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正值大明王朝发动“平播之役”,郭子章的施政要务之一就是充当“平播之役”中的贵州方面军事政治最高主管官员。受时局所左右,郭子章在编定《黔记》时在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不得不与朝廷保持一致,这样的立场观点也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灌注到了《黔记》原作的行文之中,其间必然有民族偏见和政治偏见,个别地方甚至是恶意中伤和诋毁,这些内容必然会干扰今天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为此,本课题组的第二项使命就在于将上述观点和立场上的偏颇逐一指出,以免误导今天的读者。

第三,《黔记》原作在编撰的过程中,还从当时军务抄黄、“三司”档案和府、州、县档案征引过大量的前代典籍,且均未注明其出处,加之典籍在传抄过程中又会发生技术性的讹误,这将给查证资料出处造成更大的困难。《黔记》原书所述资料是否可靠,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显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为此,本课题组针对《黔记》原作的每一项资料出处,包括所用典故的出处,都尽其可能逐一注明,以此减轻今天的读者查找工具书的困难。同时,还对原作的征引讹误和疑点也尽可能做出考证,使该书变得更利于今天的读者使用。

第四,该书的编撰体例虽说堪称完备,但因该书涉及内容过于庞杂,代考代查的内容非止一端,因而尽管原作者在体例的规制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兼备了纪传体、编年体、方志、随笔、纪文等明代典籍编修之所长,但依然很难做到对特定人物、事件和人文资料、自然生态资料之间的互鉴、互补和互证,别说是今天的读者,即使明代的读者若经过细心的研读和考订,也很难把握原书提供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本课题研究组的最后一项使命就是将原书所涉资料与该书其他卷目相关之间的联系,尽可能注明以利今天的读者检索,从而全面把握特定时间、特定人物

的全貌。

上述四项研究任务,我们尽可能做到贯穿整套系列丛书,至于各卷之间在注释和考订上的微殊,读者可以参见各册的凡例即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疏漏讹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还望海内贤达不吝赐教为荷,是为序。

2013年1月

序

杨庭硕

《黔记》成书之日已经到了明末,有明一代的民族政策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做回顾总结了,因而《黔记》“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自然成了具有较高综合能力的“民族志”资料总汇。此前,研究贵州各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学人大量征引《黔记》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然而,贵州是明代新开设的省,而民族资料的积累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黔记》所汇集的民族文化资料自然与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值得后人珍视,但如何体现这样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却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两卷的文字记载,因为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始终与明廷经营贵州的漫长过程息息相关,以至于不把这两卷文本记录的内容放到整个贵州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中去加以考量,那么这两卷所涉及的民族文化内容,后人仍然难以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此前的学人过分把眼光关注于这两卷的文本记载,而没有将其中的记载与《黔记》全书所记载的内容相互关联起来,其研究的结果自然很难达到较高的境界,最多只能做到就文本而论文本。

杨曾辉、麻春霞二人新近推出的《黔记·诸夷》考释一书,则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这两卷书做深层次的资料发掘和解读。他们是在把握全书内容的前提下,把这两卷书放到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现实中去对这两卷文本做解读和考释,从而能够揭示文本背后的信息,能够看透郭子章原文中言而未及的内容。通过此项研究,后人在引用来自《黔记》的民族资料肯定可以获得全新的感受。该书能够把握明廷对贵州地区民族政策的

变迁脉络,透视政策对民族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它不是对“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的简单复述和注释,而是在《黔记》文本的基础上,对明代贵州各民族文化做了一个全面的复原,使今天的读者不仅看清明代的贵州各民族是什么样,而且还能够进而发现造成这种文化事实的政策动力。仅就这一点而言,两位作者的努力就已经值得肯定和发扬了。

郭子章编写这两卷书时早就敏感地意识到明人所了解的贵州境内各民族文化资料,与宋代以前的汉文典籍对贵州地区民族文化的记载很难衔接,原因在于中央王朝对贵州地区长期脱控。这虽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但在探讨贵州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时,却肯定会因资料记载的中断而困难重重。在暂时无法弥补这一空缺的前提下,郭子章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宋代以前的汉文典籍记载汇编为“古今西南夷总论”,把问题正面地提出来,并试图加以解答。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解答并不理想,但提出问题的功绩却值得赞许。两个年轻人的新作其长处正在于将“古今西南夷总论”所提供的资料线索与《黔记》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六卷、第七卷,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做了系统的对比,从而做到了理顺《黔记》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给“古今西南夷总论”做注。将郭子章《黔记》中隐而不显的内容逐一挑明,各种历史文化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清理,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够感悟到其间的内在关联性。应当看到,这两项研究工作有助于将400多年前编纂的“民族志”与当代的贵州各民族实情做到有效地对接,同时还澄清了目前学界颇有争议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因为这本新作的存在而变得离我们更近,更容易把握。民族文化的变迁极其错综复杂,但变化最快、变化最显著的主要动因总是与相关民族政策的变迁最密切。如何把握民族政策对各民族文化的引导作用,此前的研究并不系统和完整。为了突破后人认识上的这一困难,该书特意编纂了“导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导读”不仅适用于《黔记》,也适用于类似历史“民族志”的整理与研究。这篇“导读”本身就是立意新颖的新文化变迁论,但愿读者能够对这篇“导读”稍加关注,肯定会对明代贵州各民

族文化的理解起到启迪作用。

自明代贵州设省以来,前后出了好几部“通志”,涉及贵州民族文化的专著也不少。然而,这些著作各有各的长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民族志”资料的首次报道而著称;(嘉靖)《贵州通志》则是以某些文化资料的完备和精准而引人注目;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则是以它的系统和完备而获得好评;《广志绎》则是在朝廷与各民族之间去展开“民族志”资料的叙述,使读者能够看到这些民族文化事实的背景;《黔记》的长处则在于它具有宏大的篇幅,内容涉及贵州的方方面面,“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仅是全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事实上,在《黔记》的各卷中,都涉及贵州各民族的资料,“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仅是提供一个纲目性的线索而已,因而仅仅因为《黔记》这两卷的资料取材于上述各书,有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的记载类同,就误以为《黔记》的这两卷文本价值不高。这显然是一个误断。杨曾辉和麻春霞的这部新作,其实正好回答了上述质疑。该书充分表明,要从事贵州“历史民族志”的研究,不能够仅看“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而是需要通看《黔记》的每一卷,因为事实上“诸夷”和“古今西南夷总论”中的线索在《黔记》中已经渗入其他各卷之中,是以一个整体出现的,是一个子系统而成为《黔记》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样的认识和以此为依据所做的解读和注释,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黔记》原文,而且还贯彻了一套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诚然,“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课题。对于年轻人而言,要做到理想的境界纯属苛求。本书存在着若干不足,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瑕不掩瑜。在大家关注这本著作的同时,也希望海内贤达能够理解和支持年轻人,多给他们一些批评和指正,那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也就不难发扬光大了。

欣慰之余,谨此为序。

2012年3月12日于吉首大学创业园

凡 例

本书在排印时,尽可能地忠实于郭子章《黔记》原文本的固有面目。为此,本书的排印以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为工作底本,我们取准于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3)史部·地理类〈黔记〉》的影印本。在排印过程中,对原文中的避讳字,一律恢复原字。原文均未用标点符号,本书排印时,做了标点断句,此工作由赵平略先生完成,特此说明。

本书对[明]郭子章《黔记》原文的考释,分八个层次加以揭示和说明。它们分别是:一、【题解】栏;二、【校勘】栏;三、【注释】栏;四、【正义】栏;五、【疏正】栏;六、【索隐】栏;七、【考辨】栏;八、【备考】栏。所有考释均按上述次序依次排印于《黔记》各段正文之下。如遇《黔记》原文无需做某项考释,则相关栏目可以告阙。

一、【题解】栏。本书对原文的某一段落进行一个总的说明,意在帮助读者能够针对这一总的段落有个整体的把握,促进读者对原文进一步理解,而且也能够为下文的各栏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前提工作。在该栏目中,并不是每一个专条都有【题解】,而仅是针对那些读者理解时难度较大或容易出现误解的条目进行编撰。

二、【校勘】栏。本书对原文的校勘,在正文的排印中均注有顺序标号,校勘工作按顺序标号依次编排,以方括号[一][二][三][四]标识。在【校勘】栏中,则明确列举校勘的理由和依据,供读者参考。整个校勘分三种情况酌情处理:其一,凡原书中极为明显的错、漏、衍、讹,对出错的原因能查到可凭的依据,如不予以订正会影响原文的表意,在慎重决策后

再做以匡正,并在【校勘】栏里正面说明校勘理由;其二,凡《黔记》原文中非重大出入者,本书一般不改正正文,只是在【注释】栏说明相关典籍记载的差异,供读者参考;其三,凡原文中语意含混或者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者,凭借对上下文的分析,有理由相信是原文中技术错误者,而又无法查明出错的原因和匡正的依据者,那么本书将在【校勘】栏中加以分析,提供阅读的参考,但也不改动原文。

三、【注释】栏。本书对原文的注释,出注点在正文排印中也有序号标识,以1、2、3、4……标识,在【注释】栏中将依次做注。做注的原则是针对原文中的字、词、句,根据现代汉语惯例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以利于今天的读者正确理解《黔记》原文。出注的内容有:一是对生僻字、词,按照现在的注音、释义习惯加以注音和释义。二是对特殊的古代汉语语法,按现在汉语惯例加以解释说明。三是对原文中省略的字、词、句加以逐一补足,增强读者的理解。四是原文语意晦涩难懂,或者古今语意差异较大者,则另加说明,务使今天的读者能够把握原文本意。五是对原文中其他一些难懂的内容,则视情况的需要将原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以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

四、【正义】栏。本书的【正义】栏所做的考释,在原文的排印中不做标识,而是在【正义】栏下,按照原文的先后次序依次排列考释的各条具体内容。每一项正义都依次在【正义】栏的序号下,标明出注的字、词、句。读者可以以此为线索核对原文。【正义】栏所做考释的内容包括:一是原文中明确提到对理解原文至关重要的人名、地名、器物名或事件名,均作相应的补充说明。二是原文中明确提到的专用术语,明代时特有的用语或者转引前代的专用术语,本书均转引相关的参考资料,给予必要的说明。三是对古今地名、古今时间用语,本书将查证相关资料做出相应的说明,以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原文涉及的地点和时间。四是《黔记》一书的某些行文惯例和用语惯例,本书作者将结合对《黔记》原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通盘把握后逐项加以系统说明,以利于读者正确地把握原文。整个【正义】栏的资料来源,均出自相关的典籍和工具书,本书所做的工作仅限于简略地转述,以帮助读者正确地把握原文。本栏目不表明本书作

者的观点立场和对原文的认识,仅是客观地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

五、【疏正】栏。其条目编排的情形与【正义】栏同,疏正的目的在于帮助今天的读者正确理解原文的上下文关系。具体出注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由于按照明代的语法惯例,很多用词与现代的惯例不同,甚至省略掉复句的关联词,或者在原文中行文做了大量的省略,本书将做出必要的说明。二是原文中涉及很多的背景材料,而原文未作交代,或者是在其他卷目才做交代,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对此本书也做了相应的说明,以免读者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三是由于当时的用语惯例和今天的用语差异太大,以至于《黔记》的某些字、词、句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会引起理解上的分歧,本书将对各种理解上的分歧均加以揭示,并指出较为正确的理解,供读者参考。四是《黔记》原文中某些字、词、句涉及的背景知识很多,简单地转引工具书,今天的读者仍然无法把握,本书将凭借自己的理解做出说明,供读者阅读参考。【疏正】栏所做的考释系本书作者的初步研究成果,反映了本书作者对原书的理解和认识,因而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可以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原文,本栏目仅是提供参考而已。

六、【索隐】栏。【索隐】栏是针对原文特殊需要而做出的专题考释,因而本栏目所做的考释都有标题。考释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参考性的知识、背景和观点。凡原文中除了字、词、句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外,还涉及文本背后的相关资料,特别是《黔记》原书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等,或者是当时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事实、法律、典章制度等,而且相关内容在原文中又没有正面提及者,本书作者将在【索隐】栏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补充说明和揭示。一般而言,本栏目所做的考释一般是原文中隐而不显的内容,但有时又是理解原文必需的背景资料,本书作者才在【索隐】栏中有针对地加以说明,因而所做的说明仅具有参考意义。希望读者注意,它既不代表《黔记》原书的字面含义,也不能确保考释的内容绝对正确。

七、【考辨】栏。本书的【考辨】栏是针对原文展开的专题讨论,集中表现为对原书的记载有可疑者加以考证,因而每条考证均有标题。凡与当时相关记载存在着明显差异,甚至相互冲突,读者难以明辨其是非者,不管是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还是相关的思想,本书将征引相关的资料

针对原书的内容展开考订,务求澄清事实的真相,匡正失误。或者对《黔记》原书所做的相应贡献和取得的成就加以肯定,以利于读者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黔记》原文。

八、【备考】栏。本书的【备考】栏是针对《黔记》原文的可疑内容而设置的,凡《黔记》所涉及的各项内容,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存在重大疑问时,本书将针对这些疑问展开专题讨论,因而本栏目的考释往往需要跨原书的卷目展开分析讨论,同样对每一条考释都附有标题。鉴于此类问题的复杂性,本栏目的任务仅是澄清疑问的实质,提出澄清疑问的可行方法,而不做最终的结论。目的是帮助今天的读者发现问题,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本栏目的讨论,对读者而言,同样仅供参考,但本栏目所考订的内容则是本书作者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不当之处也请海内外贤达提供批评指正。

本书的所有各栏考释,均用五号宋体排印,但各考释栏目之首则用【】标识,【】栏目名称均用仿宋五号黑体排印。

导 读

郭子章所撰《黔记》无疑是明代贵州私人所著方志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该书对明代生息于贵州地区各少数民族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编撰,无疑是研究贵州各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关键史料来源之一,因而学术界渴望《黔记·诸夷·考释》一书尽快出版,也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然而,从《黔记》出版到今天,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与明代刚刚设置的贵州相比,今天的贵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郭子章编撰该书的背景已经面目全非了。因此,今天的读者要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揣摩郭子章编撰该书的意图,把握他真实的学术思想,全面认识和理解在该书中所反映的明代贵州民族文化,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笔者付出的这些努力虽然可以给予读者一定的帮助,但要真正读好、读懂并用好这部专著,困难重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进一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利用这部珍贵的民族文化典籍,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其间存在的各种障碍做一个整体性的说明,并希望读者借助这篇“导读”能够排除认识上的一些偏颇和规避客观存在的各种障碍。至于是否能达到目的则不敢自以为是,还望读者遵循历史人类学的治史规范,凭借“导读”的指引去创新式的理解,做到举一反三。若能有所得,那将是笔者莫大的欣喜。具体到《黔记》“诸夷”卷而言,最容易被今天读者所忽视的背景材料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的障碍。

其一,资料涉及的范围很不相同。贵州虽说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建省,但到郭子章《黔记》一书出版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即令到了全书出版的万历中后期,贵州省的辖地范围与今天相比,仍然存在极大的反差。大致而言,直到明末时,贵州行省所辖范围还不到今天贵州全省总面积的41%,因而在《黔记·诸夷》中提到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

并不是发生在今天贵州省的辖地范围内,而仅是发生在今贵州省辖境极为狭小的范围内。郭子章在《黔记》中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全部在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言而喻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外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生息着,而且和生息在今贵州省辖境内相关民族有关。要查到这些区域内各民族在明代时的资料,是《黔记·诸夷》无法提供的。

当代的贵州省辖境从明代建省时起,就是从周边湖广、广西、云南和四川四省划拨而来的。到《黔记》出版之际,尽管经历了200多年的不断扩大,当时贵州省的面积与今天贵州省的面积相比,仍然小得可怜。大致而言,今天贵州省的辖境,是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基本定型的。在这一时段范围内,陆续划入贵州省的辖地可以大致分述如下。一是从四川省划拨而来的土地包括:遵义市、桐梓县、道真县、习水县、赤水县、仁怀市。二是从广西划拨而来的土地包括:荔波县和三都县的南部地区,罗甸县、望谟县、安龙县、册亨县、贞丰县全境,兴义市全境和兴仁县的一部分。三是从云南省划拨而来的土地包括:威宁县和赫章县。四是从明代湖广行省划拨而来的有天柱县。除此之外,在今黔东南自治州的剑河县、台江县、雷山县、丹寨县和三都县的北部地区、从江县和榕江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在《黔记》成书之际,这一地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界”。这里不仅朝廷官员不能够进入,就连周边的土司也难以进入,因而明廷对这一区域内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几乎一无所知,郭子章《黔记》当然也无法对他们做出准确的说明。在明代,这样的地区还不止黔东南一地,今黔西南州与安顺地区接壤的山区一带也是大片的“生界”。这两片“生界”都是在雍正“改土归流”时朝廷官员才正式进入的。要收集这两片地区各民族在明代时的文化资料,郭子章的《黔记》一书根本帮不上忙。除了这两片大的“生界”外,小的“生界”还有今天贵定县、龙里县、开阳县和福泉市毗连地带,亦有今天铜仁地区梵净山的绝大部分山区,在《黔记》成书时也属于“生界”范围。明代生息于在这两个片区内的各民族文化资料在《黔记》中同样无法找到。

至于从邻省划过来的那些县、市,读者要想了解明代时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料,不能够查阅《黔记》,而要查阅相应的各省地方史志资料。比如,要查阅明代天柱县的民族文化资料就得查阅明代的《湖广通志》、《辰州府志》等;要查阅荔波县和三都县的明代各民族文化资料就得查找